

革命回忆录

(三)

人民出版社

革命回忆录

(三)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11,000 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60,001—27,000

书号 11001·465 定价 0.39 元

00344 14

《革命回忆录》丛书编辑例言

为了收集、积累、保存有关中共党史资料，以满足党史研究和教学的需要，特编辑革命回忆录丛书，分册陆续出版。

本丛书内容，包括老党员、老干部和老红军所写的回忆录，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一些重大事件及革命斗争亲身经历者的访问记，以及革命烈士的传略和纪念文章等，仅供参考。

《革命回忆录》上刊载的文章，力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但因一个人的革命实践有限，或因记忆有误，难免有不尽详实之处。如某些事实有误，或有不同的见解，欢迎提出订正、补充。并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八月

目 录

渭华起义简述	校 征	(1)
四上井冈山和湘南特委	杜修经	(28)
彭总在平江起义中一事	方 强	(41)
反“围剿”片断	李 基	(48)
红九军团四渡赤水	涂通今	(58)
在中条山高高举起我们的红旗	温建平	(75)
战斗在桂林的《青年生活》	蒋宗鲁	(86)
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一些情况	林 蒙	(95)
川东地下党在南方局领导下进行 斗争	廖志高	(102)
陈毅同志对我们卫生工作的亲切关怀	崔义田	(110)
柯棣华是我永远不能忘却的兄弟	江一真	(124)
反磨擦斗争前后	郑 钟	(136)
上饶集中营里的斗争	陈念椿、黄迪菲	(147)

渭华起义简述

校 征

一九二八年四月至六月，在陕西省东部爆发的渭华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十四次武装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全国较大的武装起义之一。根据起义参加者的回忆和有关资料，现将这次起义的经过简述如下：

一 起义前陕西革命力量的发展

渭华起义以前，民主革命思想就在陕西省内长期传播着；参加这次起义的骨干力量，就是受这种革命思想的启发教育，逐步投入革命洪流里的。

早在辛亥革命时，陕西省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井勿幕，就曾于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八年和吴玉章同志建立了经常联系。一九〇八年二月，他去日本东京，以陕西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为核心创办了《夏声》杂志。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夏声》杂志在第二号上发表了《二十世纪之新思潮》一文，对《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井勿幕还以“侠魔”为笔名，在《夏声》上发表了好多篇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的文章。这个杂志主要向陕西地区发行，读

者对象主要是革命党人、青年学生和旧军队的下级军官。

井勿幕在辛亥革命以前，就明确地提出同盟会要“与一般工农人联络”，^① 亲自支持培养了青年农民杨虎城的反抗斗争。他直到一九一八年被杀害，始终坚持民主革命斗争，曾经受到孙中山和黄兴的称赞：“呼为后起之秀，招为指臂之助”，“誉为西北革命巨柱”。^②

渭华起义的一部分骨干力量，是在陕西当时拥护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和其他北洋军阀的靖国军里成长起来的。后来参加渭华起义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混成旅旅长许权中，辛亥革命时是一个年仅十八岁“投笔从戎”的学生。他参加了当时的“敢死军”队伍，是一个冲杀在前的勇敢战士。“敢死军”一举攻下临潼县城，杀了清朝的知县，有力地配合了省城西安的斗争。许权中还可充任靖国军第五路学生军的中队长，总司令部的绘图科长，在孙中山创办的广东韶关讲武堂炮科学习了一段。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陕西籍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工人运动与革命斗争，并通过他们创办的《共进》和《新潮》等刊物，公开向陕西的读者介绍《资本论》等著作的基本内容和伟大意义。

一九二一年夏，曾接受李大钊同志教导的魏野畴（原名魏风标，陕西省兴平县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毕业，一九

①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一五三页。

② 《井先生纪念碑铭》拓片。

二三年春入党)和李子洲(原名李登瀛,陕西省绥德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一九二三年春入党),到华县咸林中学和三原渭北中学任教,宣传马克思主义,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浅说》、《共产主义ABC》等,播下革命种子。

一九二二年八月,在武汉中华大学上学的王尚德同志(渭南人,早期党员)和恽代英、肖楚女、林育南、李求实等同志发起组织时钟社、共存社,举办利群书店,并和董必武、陈潭秋同志有过联系。根据董必武同志的嘱托,他返回家乡渭南县赤水镇,创办了赤水职业学校和平民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与魏野畴同志经常联系。这年冬季,他亲自创建了陕西省第一个基层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团支部(一说陕西特支,一说陕东特支)。

一九二三年春,魏野畴同志入党后与上海团组织派来的党员武止戈(渭南人,上海大学学生,早期党员),共同创建了西安第一个团支部。高克林(当时名高文敏)、张含辉等就是这个支部的团员。

一九二四年夏秋,吕乾佑(河北省枣强人,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早期党员,一九二八年牺牲)、雷晋笙(长安县人,复旦大学学生,早期党员,曾任山东省委书记,一九三一年牺牲),又成立另一团支部。一九二五年成立团西安特支,选举高克林任书记。陕北与渭北的党团组织也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相继成立。刘志丹(刘景桂)、王子宜、郭洪涛、张仲实(张安仁)、王超北、赵宗润、王云等同志,都先后参加了团和党的组织。刘志丹、赵家润、张仲实和王超北等同志还先后担任过团支部的书记工作。《唯物史观》、《劳农政府》、《资本论》入门、《社

会主义浅说》、《马克思主义浅说》等理论著作，和《向导》、《中国青年》等党、团机关报，已经成了许多党、团员的主要读物。党、团员们深入群众，组织师生募捐，支援罢工斗争，追悼“二七”烈士，发动农民抗款抗租，向反动政府“交农”（交出农具，不干活了），驱逐军阀军队，促进国民议会的召开，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开展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发动爱国雪耻运动，都搞得轰轰烈烈，既教育发动了群众，也锻炼提高了自己。

从斗争中发现了优秀分子，有些被吸收入党，其中部队的同志，有的继续留在部队，如陕北镇守使井岳秀部的阎红彦、雷恩钧等同志。由谢子长和从北京共进社派来的共产党员李象九，与阎红彦、雷恩钧等，在井岳秀部的石谦营（后扩编成团、旅）建立了军事支部。另外一些同志，则被选拔出来派去学习提高。如刘志丹、王泰吉、阎揆要、周益三、张宗逊等同志，就是这时先后派到黄埔军官学校去学习的。其中有的同志后来也成了渭华起义的领导人或骨干力量。

当时，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国民军中担任旅长职务的史可轩同志和其他党员同志，也在军队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如在该旅任团长的许权中同志，就是史可轩同志教育、培养并经李大钊同志的关怀帮助，于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

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陕西党组织和党的北方区委，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春，先后派出乔国桢、杜松寿等十六位同志，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他们于一九二六年九月的第六期结业后，先后返回陕西。

陕西的农民运动是在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一九二五年十月七日，陕西建立了第一个基层农民组织——渭南县东张村农民协会。赵润生、乔国桢等同志回来后，分别在三原、渭南、华县等地领导农民运动。在魏野畴等同志具体领导下，发动农民开展了反对北洋军阀包围西安的武装斗争。

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给渭华武装起义创造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党影响的正规部队与地方民团、红枪会等，是武装起义的基本力量。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则为武装起义培养了骨干分子。这些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二 起义前陕西的政治形势

一九二六年二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确定了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各方面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五月，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开始向湖南挺进。七月一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布了《北伐宣言》，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北伐军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领导下，得到了各地工人的有力支持和广大农民的积极配合，革命战争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陕西的局面却还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一九二五年二、三月间，共产党领导陕西广大群众，迫使段祺瑞

政府不得不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宣布北洋军阀豢养的陕西省长兼督军刘镇华下台。一年以后，军阀头子吴佩孚、张作霖和阎锡山又勾结在一起，共同支持刘镇华，驱赶着他从各方网罗起来号称“十万大军”的乌合之众，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七日闯进潼关，直扑西安。由魏野畴等同志负责的西安党组织，立即帮助各路国民军首领在三原召开了军事会议，研究了军力部署，决定分兵坚守西安、三原和咸阳等重要城市，准备和刘镇华的镇嵩军进行长期战斗，以响应和配合南方的北伐战争。会后，魏野畴等同志与杨虎城将军率领陕军三个旅进驻西安，与李虎臣的部队共同坚守省城。魏野畴同志后来又和党的少数领导骨干，化装出城转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打击和牵制镇嵩军的力量，配合了反围城的战争。

为了解除西安之围，在党的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同志帮助下，由原来的北方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和陕西国民军首领于右任，将旧部重新组成国民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共产党员刘伯坚任总政治部主任，史可轩、刘志丹、方仲如、李大章等党员同志，分任各级军政领导职务。军队分两路向西安进发。

史可轩同志于一九二六年初去苏联学习后，实际负责领导他那个旅的许权中同志，率领全旅在北京郊区的上苇店、门头沟一带驻防，于同年七月七日发动了门头沟起义，接着参加了攻击吴佩孚部队的南口战役，击溃了敌人五个旅的反扑，歼敌一千多人，然后转战到包头。他作为援陕第三路军总指挥，又从包头经陕北挥师南下，到达陕西关中地区。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路大军先后抵达三原、咸阳一带。国民联军与守城的陕军里应外合，党领导下的农民军也积极

出击，终于战胜镇嵩军，西安之围遂解。

西安解围时，陕西各地共有共产党员三百八十八人，于一九二七年一月成立中共陕甘区委，负责领导陕甘两省党的工作。三月中旬，在西安召开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耿炳光为书记，魏野畴（宣传）、李子洲（组织）为委员。

同年一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实际上就是陕西军政府，于右任、邓宝珊分任总、副司令，魏野畴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惠又光是挂名的），史可轩任保卫部部长，许权中任军事部部长兼保卫团团团长，马明方（马济民）任团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杨明轩任教育厅厅长，水利专家李仪祉任建设厅厅长，王尚德任出版局局长，共产党员吴仲桢、王陆一先后任秘书长。

为了培训党员骨干和军政干部，魏野畴和李子洲举办了党员骨干训练班和军事政治队，共产党员张汉民任中队长。王炳南、吕剑人、王菊人、吴岱峰、于达夫等近百名党员与青年参加了学习，后来大部分成了党在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有的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张汉民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秘密工作，曾担任过杨虎城将军的警备旅旅长。汪锋同志任该旅军委联络员。他们都为党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为了更好的培养军事政工干部，党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史可轩同志任校长，邓小平（邓希贤）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团省委书记高克林同志兼任该校党的特支书记，许权中同志任总队长，张汉泉等任学生大队队长。这个学校为党培养了五百多名优秀的军政领导骨干。

为了培养地方工作与群众运动的领导力量，党还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由共产党员刘含初任院长，李子洲同志任副院长兼总务长，吴化之任特支书记，招收了五百多名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中的党员、团员、积极分子、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为党在陕西的长期革命斗争，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

一九二七年二月，党组织领导成立了西安工人俱乐部，三月成立了陕西省总工会筹备处，五月一日召开了总工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三十多个团体，一千多人，选举了以共产党员张含辉等为首的执行委员会，致电全国总工会和赤色职工国际，显示了陕西工人阶级的力量。

同年三月，组成了全省农民协会筹备处，五月正式成立了省农协，六月一日召开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了领导机构，加强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并派出五名代表去出席七月一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华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在省农协的领导下，农协组织很快普及到六十多县（全省九十多县），领导的农民武装达到十多万人，会员达到七十万五千一百零六人（大革命失败后，会员人数锐减，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省委扩大会议核实的数字是三十七万人），仅次于湖南和广东，居全国第三位。

陕西党组织为了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开展反对新军阀的革命斗争，在成立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的同时，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召开了全省学生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号召青年学生加强团结，和工人、农民及各阶层人民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国革命而斗争。

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开始后，陕西党组织领导全省城乡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五月五日，在西安“红城”（即现在的新城），召开了有十多万参加的纪念“五一”、“五五”和声讨蒋介石的群众大会。全省各地很多县城也都召开了讨蒋大会，发表讨蒋通电。

冯玉祥在革命人民强大的讨蒋声浪中，一方面大谈“矢志革命，誓扫残凶，拥护工农政策，维护工农利益，进行世界革命”；打着与武汉国民革命军“共同北伐”的旗号，继续利用国民联军出师潼关，接连攻克信阳、郑州、开封，也为自己扩展了地盘。一方面又“调解宁汉纠纷”，与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往返频繁，一度参与了他们策划的“清党”反共活动。

在这一关系到党和革命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如何有计划地迅速组织退却，保守实力，转入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农村，继续坚持斗争，就成了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面临着的严峻考验。

三 起义的酝酿与准备

陕西的党组织，随着革命的深入，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二七年五、六月间，全省党员已达两千多人，三十多个县都建立了党、团组织。军队里也派进和发展了二百多个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根据中央指示，七月上旬中共陕甘区委改为陕西省委，耿炳光任书记，魏野畴为军委书记，李子洲等为委员。

冯玉祥和于右任，虽然倒向蒋介石，但他们与蒋介石、汪精卫仍是相互利用，各有打算，对共产党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杨虎城、李虎臣等陕军和地方势力，与冯玉祥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其中不少人对和共产党建立的友谊比较珍惜，还继续保持着合作态度。这就是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党组织损失较小的客观原因之一。如陕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魏野畴同志，起初是杨虎城敬重的知识分子，后来又是策动和支持杨虎城坚守西安的战友。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南汉宸等著名的共产党人，都聚集到杨的部队里，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杨虎城不但没有迫害他们，反而向他们表示自己要“当贺龙”，并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皖北特委虽已同意，但河南省委没有批准这一申请，但杨虎城仍继续与他们合作。

当时的冯玉祥为了分化瓦解陕西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首先向许权中同志施展权术。他将许权中同志请去赴宴，在筵席上称赞许权中同志是“智勇双全的北伐名将”，“愿今后更好的共事”。席毕，他又请许权中同志到他的卧室，诱之以高官厚禄，说自己要“率部东征了”，想请许权中同志将他的保卫团也开赴河南，与他共同“创更大的家业”。许权中同志将计就计，坦然答道：“我愿随冯总司令东征，不过我老母病重，需要将后事安排一下，晚走几天”。冯玉祥自以为得计，又立即夸奖他是个“孝子”，准许“晚来几天也好”。

许权中来到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向邓小平、史可轩等同志如实地报告了冯玉祥的引诱拉拢，共同商定先给中山军事政治学校的五百多名师生全部配发枪枝，与保卫团合并起来，组成党直接掌握的一支劲旅。这时，魏野畴同志已经被迫离开西

安，到远在安徽的杨虎城部担任政治处长去了。留在西安的党的另外两个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和刘伯坚同志，也都接到党中央的调令，去接受新的任务。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在他离开西安前，向史可轩、许权中和高克林等同志提出，要很快将部队拉出西安，相机配合农民起义，打击国民党新军阀，建立苏维埃新政权。这是符合党中央当时的斗争方针和陕西的实际情况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为了挽救中国革命，由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举行了南昌武装起义。八月七日，又由瞿秋白同志在汉口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并号召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陕西省委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由李子洲同志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省委书记耿炳光执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选举了新的省委，确定了新的工作方针，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的决议案》、《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组织工作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等等。强调党员要到军队里去，掌握武装力量，培养军事干部，学习军事知识，结合农民运动，组织武装起义。这次会议澄清了混乱思想，明确了斗争方向，坚定了革命信心。会议仍然选举耿炳光担任省委书记，李子洲同志被选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同时，和“八七会议”一样，没有注意防止左倾盲动情绪，使后来的斗争受到了一定损失。

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九二六”会议决议，省委派负责军委工作的唐澍同志（广东人，黄埔军校学生），带

着毛泽东同志率领部队登上井冈山、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消息和传单去陕北，与谢子长、李象九等同志作武装起义的准备。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以李象九旅的两千多人为主力，在陕北清涧县发动了武装起义。

史可轩、许权中和高克林等同志，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先将中山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与保卫团的官兵集中起来，又有一些党团员和革命青年也来投奔革命军，人数猛增至一千五百多人，于七月二十四日（一说二十九日），撤离西安，开到许权中同志的家乡陕西省临潼县交口镇一带驻扎待命。

这时，史可轩同志接到省委指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传达。省委文件上指出：“要想办法找机会，使部队不出潼关，找主求生，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同志们分析了陕西的政治形势，认为陕西的军阀部队与关中的杂牌部队虽然大部分依附了蒋介石，但他们为了维护各自的统治地位，都在扩充兵力，明争暗斗，我们仍可利用矛盾，“找主求生”，保存和扩大革命力量。

为了“找主求生”，史可轩同志提出要去富平美原镇联系岳西峰的部属田春生谋一出路。许权中同志认为岳西峰反共的态度一直很明显，在当前政治形势下，田春生不可能接纳史可轩同志。虽经再三劝阻，史可轩同志仍觉得自己过去曾给田春生帮过大忙，他不会“忘恩负义”，便于七月三十日中午带着警卫人员到美原镇去了。不料他们一到，就被田春生扣押起来，第二天便被活埋了，跟着敌人更向革命军进行了偷袭。

许权中同志满怀悲愤，率领部队奋起抵抗，击败了敌人的

进攻，显示了我军的威力，在农村站住了脚跟，占领了地盘，又迫使岳西峰部下的师长冯子明议和，承认建制，供给粮饷，编为补充旅，由许权中同志任旅长。冯子明派来个暗探当旅参谋主任，监视旅长的各种活动。蒲城有个农民武装首领杨锡民，带上所部投奔许权中。许权中见杨锡民是以“打富济贫”为己任的，向他进行了教育，任命他为警卫连连长，让他负责监视参谋主任。他又通过朋友关系，收编了两个营的其他部队。这样既能“求生”，保存实力，又能扩充部队，壮大力量，准备拉到陕北去与唐澍、谢子长等同志并肩战斗，创建农村根据地，建立革命新政权。

这时，唐澍和谢子长等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已经占领了宜川县城。但他们与旅长李象九在部队打不打革命红旗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争论。李象九坚持仍沿用井岳秀部十一旅的旧番号，以免引起敌人注意，继续向我军进攻。双方相持不下，决定由唐澍同志回西安向省委请示。

唐澍离开部队后，李象九擅自改编了部队，打出了十一旅的旧番号，下编三个营，他自任旅长，让唐澍任参谋长，谢子长任营长。在敌人大军围攻下，部队损失惨重，十月二十四日转移到陕西韩城县时，只剩下三四百人了。这时，李象九又接受了杨虎城部王保民的改编，称为“独立旅”，他仍自任旅长。

唐澍同志回到西安，与部队失去联系，不了解战斗失利的情况。省委决定由许权中率领部队北上，与起义军会合，在宜川、延长一带创建革命根据地，并派阎揆要同志与唐澍一道返回宜川，以加强部队的领导力量。

当许权中同志在临潼一带正待命北进时，唐澍、谢子长、